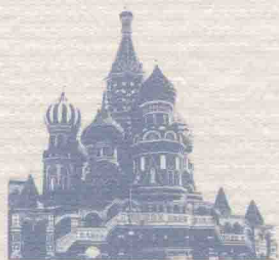


“俄罗斯学”在中国

(第二辑)

РОССИЕВЕДЕНИЕ
В КИТАЕ



主 编 / 李永全

副主编 / 庞大鹏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俄罗斯学”在中国

(第二辑)

РОССИЕВЕДЕНИЕ
В КИТАЕ

主 编 / 李永全

副主编 / 庞大鹏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罗斯学”在中国. 第二辑 / 李永全主编.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12
ISBN 978-7-5201-3804-8

I. ①俄… II. ①李… III. ①俄罗斯-研究 IV.
①K51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57265 号

“俄罗斯学”在中国 (第二辑)

主 编 / 李永全

副 主 编 / 庞大鹏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张苏琴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世界出版分社 (010) 59367004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274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3804-8

定 价 / 9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言

与历史同行的中国“俄罗斯学”

李永全

在中国，俄罗斯研究是一个重要的领域。俄罗斯研究始终与中俄（苏）关系的发展密切相连，始终与中俄关系的历史同行。

近些年，俄罗斯研究逐渐被“俄罗斯学”的概念替代或涵盖。“俄罗斯学”既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学科，也是一个新兴学科。说它是历史悠久的学科，是因为“俄罗斯学”与它的研究对象是共生的，只是每个历史时期的称谓不同而已；说它是新兴学科，是因为以“俄罗斯学”作为俄罗斯研究的学术术语是近些年的事。即使在俄罗斯，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被普遍接受和广泛使用的 *россиеведение* 也是近些年的事情。

中俄学者普遍认为，“俄罗斯学”是综合学科，把俄罗斯作为完整的结构、特殊的社会现象、自然和精神的有机体，即把俄罗斯作为一种文明进行研究。

当“俄罗斯学”的对象是研究俄罗斯文明时，这个学科的内涵是相当丰富的，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也是多样性的。但这不是本序言要谈的主要问题。

出版《“俄罗斯学”在中国》文集的初衷是抢救历史，尤其是1949年以来俄罗斯研究（“俄罗斯学”）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抢救“俄罗斯学”

的历史也是抢救“俄罗斯学”研究单位的历史。第一辑《“俄罗斯学”在中国》文集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许多单位的年轻人正是通过这些历史叙述了解本单位历史的。那是一段段值得回味、值得思考、值得记忆、值得骄傲的历史。而这段历史中的人物命运大都随着中俄（苏）关系的发展跌宕起伏。第一辑的成功出版增加了我们继续编撰《“俄罗斯学”在中国》文集的信心，也激发了学界前辈和年轻人回顾历史和了解这段历史的兴趣。第一辑中有些文章涉及的历史时期已经超出1949年，具有百年“俄罗斯学”在中国的味道，这是非常令人欣慰的。

第二辑《“俄罗斯学”在中国》的内容，除继续刊登有关单位的历史综述外，还包含一些学科史，如薛衔天老师撰写的《特殊历史时期诞生的中俄关系史研究室》，结合中苏关系的跌宕历史介绍了学科发展，读来既有历史感，也有责任感。北京师范大学顾明远教授撰写的《苏联教育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全面考察了苏联教育制度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苏在教育领域的合作历史，是一篇难得的学术佳作。本辑还刊登了一些专项历史回忆，如黑龙江大学的俄汉辞典编撰历史、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汉俄辞典编撰历史以及一些影响较大的“俄罗斯学”领域学术期刊的发展历史。

当然，这项工作还有许许多多不足之处。比如，一个单位的发展历史是很难撰写的，要写得全面、准确、权威就更难。我们觉得，在抢救历史和填补学术空白的过程中，在某种意义上写出来就是成功，而完善将是一个漫长的、严谨的学术过程。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无知无畏”地开始了这项事业。事实上，对于第一辑的文章，大多数单位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学术界更是给予我们巨大的鼓励。

《“俄罗斯学”在中国》，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涉及的学科和领域非常广泛，探寻这段历史既有吸引力，也有压力。已经撰写和发表的文章在这个进程中只是沧海一粟，我们想走得更远，需要学界前辈、朋友和同行的支持。

在《“俄罗斯学”在中国（第二辑）》出版之际，向支持这项工作的朋友们表示感谢，致以敬意！欢迎对这项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俄罗斯历史与文化研究室	
学科发展历程	周 国 长 / 1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学科建设发展	
历 程	高 歌 姜 琍 /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白俄罗斯研究与中白学术交流	赵会荣 / 27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乌克兰研究与中乌学术交流	赵会荣 / 35
特殊历史时期诞生的中俄关系史研究室	薛 衍 天 / 42
“俄罗斯学”与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 / 60
俄罗斯乌克兰研究在武汉大学	田 园 刘再起 / 94
沈阳俄文专科学校沿革	穆重怀 / 119
新华社国际部“俄罗斯学”研究的特点及成果	万成才 / 127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俄语部的沿革	盛晶晶 / 142
苏联教育对中国教育的影响	顾明远 / 159
我与北大“俄罗斯学”的开拓	李明滨 / 172



两部词典的背后

——写于《词典的历程》出版之际 叶其松 / 183

有关《汉俄大词典》编纂 陈 洁 / 188

“办一流期刊”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永远的追求 李中海 / 197

《俄罗斯学刊》：欧亚重大问题研究的中国学者视角 靳会新 / 218

《欧亚经济》：过去与现在 高晓慧 / 228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 俄罗斯历史与文化研究室学科发展历程

周国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以下简称俄东所)的俄罗斯历史与文化研究室脱胎于2000年李铁映同志倡议建立的“苏联历史学科”。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各大档案馆解密了相当数量的有关苏联政治、经济、外交以及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档案文献,为重建苏联史实提供了基础。国内的部分学术机构也通过各种途径获得了大量与苏联历史相关的解密档案,俄东所亦在列。鉴于此,李铁映同志认为有必要根据俄罗斯的解密历史档案,对苏联历史问题开展更为深刻、具体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更好地总结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俄东所“苏联史”研究室就是在此背景下而成立。

事实上,苏联解体之后,国内的苏联史学界对苏联历史的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繁荣时期。此间对苏联历史的研究主要有两个目标:一个是翻译、整理苏联解体后大量解密的苏联时期的档案,重建苏联史的史实;另一个是在重建史实后建构新的解释系统。这一时期国内设立了一系列苏联史方面的大项目。如沈志华主编的34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俄东所学部委员李静杰主持的重大项目《中俄关系档案汇编》《20世纪的俄罗斯:文件集》等。这些项目的目标都是要重建苏联历史的史实,受到学界的瞩目。本研究室人员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这些项目。如沈志华的《苏联历史档案选

编》，本研究室的张盛发、吴伟、刘显忠都参与了翻译及编注。李静杰主持的《中苏关系档案汇编》，刘显忠承担了1927~1937年卷的编注及翻译工作，张文莲也参与了一些内容的翻译。

在翻译、整理新资料的同时，本研究室人员还依据新材料对苏联历史上的很多问题进行了新的研究和阐释。自2000年以来，本研究室人员在国内外各类期刊发表论文近百篇，其中在权威期刊《历史研究》上发表多篇，极大地丰富了国内苏联史研究的内容。出版个人专著5部及多部合著成果。其中张盛发的《斯大林与冷战》在大陆和台湾同时出版，获院级优秀成果二等奖。本研究室承担的2001年立项的院A类课题《苏联通史》（八卷本）已经结项，成果被鉴定为优秀，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按专题写的大型《苏联通史》，颇为引人关注。此外，本研究室承担所内的两个创新项目：《转型前的俄罗斯：改革与剧变（1985~1991）》和《转型与重建：当代俄罗斯历史研究》都已完成并结项。

目前本研究室在如下学科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国内外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处于领先地位：苏联外交关系（苏联与西方的关系及苏联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俄罗斯思想与文化；苏联民族关系史；中苏关系中的中东路问题（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过两篇文章，引起了国外同行的关注）；俄罗斯的历史政策与历史记忆；中俄软实力比较研究等。

一 苏联外交关系研究

2000年以来，本研究室在苏联外交关系研究领域取得重大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冷战国际史研究

张盛发利用俄罗斯和美国的解密档案文献，以苏联为基点研究了冷战的起源及其发展，分析了苏联的冷战基础、冷战政策和冷战行为，认为冷战是一个双向的互动过程，美国和苏联都是冷战的源头（张盛发：《斯大林与冷战：1945~195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在美苏冷战研究的基础上，本室科研人员还就远东的雅尔塔体制、斯大林的大国合作政策、赫鲁晓夫与古巴导弹危机等发表了相关的论文（张盛发：《雅尔塔体制的形成与苏联势力范围的

确立》，《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战后初期斯大林大国合作政策的结束》，《东欧中亚研究》2000年第5期；《试析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核导弹的动机与决策》，《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2年第6期）。

此外，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也是本室研究的重点。吴伟根据俄罗斯和西方的解密档案材料，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波兰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该研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背景、进程，苏波双方以及反法西斯主要盟国之间的关系等方面，描述了自1939年9月“波兰问题”的产生到1945年9月基本解决的过程[吴伟：《苏联与波兰问题（1939-1945）》，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同时，吴伟还主持了国家社科重大课题“东欧各国冷战时期档案收集与整理”子课题“有关中国的东欧历史档案文献整理”（2012年），已经结项，并被评为优秀。在利用东欧各国档案的基础上，吴伟就东欧各国斯大林化中的中国因素、苏联与德国统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吴伟：《东欧国家苏联模式化中的中国因素》，论文集《新史料新发现：中国与东欧关系》2014年9月；《苏联与德国统一》，《历史教学》2016年第14期）。

（二）中苏关系史研究

中苏关系研究是俄东所的立足基石，也是俄东所常年跟踪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苏联解体之后，随着俄方档案的开放，中苏关系史研究进入一个新的繁荣期。本室科研人员在参与《中苏关系档案汇编》这个重大项目的过程中，利用收集到的俄罗斯与中方的档案文献，立足前人已有的研究，对“中东路事件”以及中长铁路归还给中国的历史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对这两个历史事件的原因、进程和结果提出了新的看法。刘显忠认为“中苏共管”的体制矛盾、地缘政治、中方决策失误等是造成1929年“中东路事件”的原因，事件中唯一的真正获益者是日本（刘显忠：《中东路事件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1926年中东路危机后苏联在中东路问题上态度的变化及其实质》，《安徽史学》2009年第6期）。张盛发认为，苏联归还中长铁路的主因是冷战中苏联的地缘困境需要中国成为其战略盟国以及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作用证明了这一点。铁路的归还削弱了苏联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瓦解了苏联在东北的侨民社会（张盛发：《中长铁路归还给中国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列强在中国东北的争夺与中东铁路所有权的历

史演变》，《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7年第5期）。这些论文中有两篇发表在历史学权威刊物《历史研究》上，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引发学术讨论，推动了对该问题的深入研究。有的文章还在国外发表（Лю Сяньчжун Китайско-совет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на КВЖД 1929: 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 Тихоокеанская Россия и страны АТР в изменяющемся мире. Сб. ст. / Отв. ред. Ю. В. Латушко, И. В. Ставров. - Владивосток: Дальнаука, 2009. С. 78-81）。

除了关注中东铁路之外，本室科研人员还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态度与立场、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苏共同抵制美国主导的对日媾和以及二战中的苏日关系等问题开展研究（张盛发：《战后初期斯大林大国合作政策的结束》，《东欧中亚研究》2000年第5期；《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苏共同抵制美国主导的对日媾和》，《世界历史》2001年第2期；吴伟：《重新审视“苏日中立条约”的苏日关系》，《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5年第3期）。

二 苏联民族关系史研究

1991年苏共丧失政权，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轰然崩塌。对于这一改变了俄国历史方向、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的20世纪重大事件，中国学者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力图通过对苏联历史的反思来解释苏联解体、苏共丧权的原因，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对于苏联解体的原因，有各种学说，本研究室的科研人员主要立足于解密的档案文献，从苏联的民族关系史角度出发，探讨苏联解体的内在动因。刘显忠从苏联领导人列宁、斯大林的“自治化”“联邦制”方案出发，对两者在建立联盟问题上的分歧进行了研究，认为两者的分歧主要在于各个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以自治共和国的身份加入俄罗斯联邦，还是俄罗斯联邦与其他各个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平等地加入新的联邦。他们的分歧不是原则性的，只是联合的策略和方法上的不同。苏联联邦制的内在缺陷为苏联解体埋下隐患，成为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刘显忠：《列宁的民族问题理论及实践》，载于邢广程主编《列宁对社会主义的探索》，长春出版社，2009；《对列宁斯大林在建立联盟问

题上分歧的再认识——兼论苏联联邦体制的问题和缺陷》，《史学月刊》2013年第4期；《苏联联邦制的问题与缺陷》，《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4卷第4期；《列宁民族自决权理论及其在苏联的实践》，《俄罗斯学刊》2016年第4期）。追踪溯源，刘显忠对帝俄晚期以立宪民主党为首的自由主义政党的民族观点进行了论述，认为自由派政党对民族联邦制的担忧恰恰在苏联的政治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刘显忠：《十月革命前俄国自由派政党对俄国民族问题的认识》，《世界民族》2017年第4期）。

不仅如此，刘显忠还重点关注苏联实施的具体的民族政策，特别是20世纪20~30年代苏联的“本土化”政策。“本土化”政策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的发展，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地位。但作为典型案例，“本土化”政策在乌克兰的强制实施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存在较大的弊端（刘显忠：《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的民族政策：成就与问题》，《十月革命与当代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20世纪20年代苏联“本土化”政策的利弊分析》，《俄罗斯学刊》2013年第1期；《20世纪20~30年代苏联“本土化”政策在乌克兰的实践》，《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4年第4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苏联政府对境内的德意志族持不信任的态度，将他们从俄欧地区迁移到西伯利亚等边疆区域，伤害了其民族情感，造成历史积怨和苏联的经济损失。赫鲁晓夫执政后，为二战时期被强迁的民族平反以及扩大民族共和国的权力，这一举措并未解决已有的民族问题，反而使民族问题变得更为复杂，特别是他把属于俄罗斯的克里米亚划给乌克兰，为苏联解体之后的俄乌冲突埋下伏笔（刘显忠：《卫国战争前后苏联境内德意志族人的命运》，《俄罗斯学刊》2015年第4期；《赫鲁晓夫在民族关系领域的“解冻”及其效果》，《世界民族》2014年第5期；《克里米亚半岛历史的变迁》，《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4年第2期；《乌克兰危机的历史文化因素》，《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5年第1期）。

2015年底，刘显忠和左凤荣合著的《从苏联到俄罗斯：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一书出版，该书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这是国内又一专门研究苏联及俄罗斯民族问题的重要著作，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该著作主要利用俄罗斯的最新档案文献，重点研究了苏

联时期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形成、发展与存在的问题，把苏联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考察；以发展的观点来考察从苏联到俄罗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演变的历史逻辑；在论述当今俄罗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时，与苏联时期进行比较，进而把握了当今俄罗斯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变化。

三 俄罗斯思想与文化研究

作为俄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核心内容之一，俄罗斯思想与文化的研究一直备受国内学界的推崇。白晓红认为，“俄罗斯思想”作为一个特定概念表达的是俄罗斯民族特有的、本质的精神因素，在“俄罗斯思想”中蕴涵着理解当代俄国问题的“逻辑钥匙”（白晓红：《俄罗斯思想的演变》，《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5年第1期）。

19世纪中晚期俄罗斯知识界的思想争辩中，斯拉夫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流派对俄罗斯此后的道路选择与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白晓红：《斯拉夫派政治思想》，《世界历史》2001年第5期）。此后，白晓红对俄国斯拉夫主义产生的根源、演进与历史影响进行了阐释，认为斯拉夫主义哲学思想的突出之处是以精神整体性反对西方的唯理主义，以东正教聚合性对抗西方的个人主义；社会政治思想强调以保持村社和地方会议的君主制社会为基础的和谐有机发展；经济思想表现为既赞同自由劳动，又维护村社土地占有制的矛盾观点（白晓红：《俄国斯拉夫主义》，商务印书馆，2006）。

对于俄罗斯的历史文化传统及其特征，本室科研人员也有所涉及（白晓红：《普京战略目标及其历史悖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7期；《早期苏维埃文化的基本特征》，《俄罗斯学刊》2011年第4期；《白银时代的俄国文化评析》，《俄罗斯学刊》2013年第6期；《俄国历史进程中的克里米亚》，《俄罗斯学刊》2014年第3期）。译文则有《帝国论与俄罗斯帝国的形成及其特点》（陈余翻译，《史学史研究》2013年第1期）。

作为广泛的俄国文化，也包括其节日活动和纪念仪式，这也是本室张文莲关注的主题。她相继就俄罗斯的节日文化、俄罗斯历史年、俄罗斯与世博会、俄罗斯地名改名争议等与俄罗斯文化相关的命题进行了研究（张文莲：《多彩

多姿的俄罗斯节日》，《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8年第5期；《俄罗斯历史年概述》，《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3年第5期；《从伦敦奥运会看俄罗斯的体育》，《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13年第5期；《伏尔加格勒改名争议》，《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4年第6期）。

四 俄罗斯软实力研究

俄罗斯是当今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大国之一。俄罗斯软实力的研究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也是近几年国际政治和国际传播领域的热点课题。俄罗斯软实力的表征之一便是俄罗斯的国际形象。作为俄罗斯国家形象主要内容的俄罗斯政治形象自苏联解体之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俄罗斯与西方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冲突，当新俄罗斯力图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时，它所展现出来的形象引起了欧美社会的不安，而与此同时，俄罗斯在中国的友好形象得到了保持和加强，从“老大哥”演变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许华：《“颜色革命”背景下媒体之争与俄罗斯形象问题》，《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5年第6期；《当今俄罗斯的国家形象问题》，《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年第2期；《西方语境中的俄罗斯形象之困》，《俄罗斯学刊》2014年第4期）。

为了改变俄罗斯的负面国际形象，俄罗斯政府通过媒体等宣传手段强化了对外宣传战略，并且塑造了普京总统的强人形象。“今日俄罗斯”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异军突起。不仅如此，俄罗斯还利用俄语作为语言媒介手段，使其在后苏联空间中的地区一体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增强软实力的重要武器。同时，俄罗斯还积极采取措施以消除西方社会对俄罗斯的偏见和误解，改善国家对外形象，缓解内外压力（许华：《俄罗斯的软实力外交与国际形象》，《国外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俄罗斯应对国家形象的困境》，《对外传播》2011年第3期；《普京如何塑造领袖形象》，《对外传播》2015年第3期；《“今日俄罗斯”因何异军突起》，《对外传播》2014年第8期；《俄罗斯借助俄语在后苏联空间增强软实力》，《俄罗斯学刊》2012年第2期）。

事实上，俄罗斯软实力最终需要硬实力的支撑，需要俄罗斯的科技、教育

等领域的引领，最终实现俄罗斯的国家复兴（许华：《俄罗斯的软实力与国家复兴》，《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5年第1期；《俄罗斯软实力中的科技和教育因素》，《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6年第3期）。俄罗斯政治精英如何认知中国关系到俄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并会直接影响中俄关系（许华：《从“冷眼”到“热盼”——俄罗斯政治精英眼中的中国形象与俄中关系》，《国外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为此，俄罗斯政府对俄罗斯科学院进行改革。2013年9月，普京正式签署改革法案，将俄罗斯医学科学院、农业科学院并入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社会各界对科学院改革褒贬不一（陈余：《俄罗斯科学院改革——缘起、进程与反响》，《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7年第4期）。

积经年之力，2017年，许华出版了《俄罗斯软实力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一书。该书从边缘层、中间层和核心层三个角度解析了俄罗斯的国际传播力、国际动员力、文化吸引力、国家形象、俄语推广战略等因素，剖析了俄罗斯软实力的历史文化基因、形象之困、战略互疑等结构性制约因素，并把俄罗斯置于国际评价体系中进行横向比较，以期全面和深入地呈现其软实力的来源、构建、运用方式和实施效果等，是该领域研究的代表作。

五 俄罗斯的历史政策和历史记忆研究

苏东剧变后，整个东欧地区和俄罗斯都面临社会转型的问题，这种转型不仅表现在制度上，而且也体现在意识形态上。随着社会主义信仰的崩塌，俄罗斯和东欧各国再次回到民族主义思潮，在历史领域则是对以往国家历史的重构，以昔日的荣光来激励国民，求得共识。历史政策和历史记忆属于现实问题，但又与历史研究密切相关，这也是本室科研人员近年来研究的主题。

从2007年开始，张盛发就俄罗斯中学历史教科书问题的缘起、进展乃至普京第三任期出版的“统一历史教科书”进行了跟踪研究（张盛发：《俄罗斯新版历史和社会学教师手册之争》，《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4期；《俄罗斯历史教科书问题的缘起和发展》，《俄罗斯学刊》2012年第3期；《普京重任总统后再次治理俄罗斯历史教科书问题》，《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3年第6期）。与此相关的则是刘显忠对2010年俄罗斯国家政权干预历史研究、把历史研究政治化的“新历史学家事件”的分析与研究，他认为，事件本质反映

了俄罗斯千百年来对自身的定位问题（刘显忠：《俄罗斯的“新历史学家事件”：缘起、社会反响及实质》，《俄罗斯学刊》2012年第3期）。

20世纪以来俄罗斯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亦对俄罗斯的现实政治和社会产生影响。政府也善于利用诸如两次世界大战等历史事件来塑造国民的国家认同和重振俄罗斯人的爱国主义情感。在对待斯大林主义等问题上，政府和国家都存在分歧。不言而喻，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法，也成为俄罗斯与周边国家价值观冲突的潜在根源（张盛发：《俄罗斯与德国在历史反思问题上的分歧与争论》，《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4年第2期；《试析俄罗斯去斯大林化项目的出台与困境》，《俄罗斯学刊》2014年第6期；《胜利历史不容篡改和玷污——俄罗斯为维护俄版二战史而斗争》，《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5年第3期；《从遗忘的战争到重要的战争——俄罗斯重新评价第一次世界大战》，《俄罗斯学刊》2017年第4期）。王桂香则对俄罗斯公共史学的兴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王桂香：《俄罗斯公共史学的萌芽与兴起》，《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4年第6期）。此外，周国长对独立以来乌克兰的历史政策也有所涉猎〔周国长：《“脱俄入欧”：独立后乌克兰历史政策的变化（1991~2013）》，《俄罗斯学刊》2016年第4期〕。

2017年是俄罗斯十月革命胜利一百周年。本室科研人员对于普京政府、俄罗斯社会对十月革命的看法以及普京政府在“统一历史教科书”中将1917年的二月革命、十月革命乃至内战的结束这段历史时期定义为“俄国大革命”等命题进行了研究（张盛发：《从十月革命到俄国大革命——俄罗斯修改十月革命名称和定义》，<http://www.dunjiaodu.com/top/2017-11-07/2089.html>；张盛发：《普京为何要否定列宁和十月革命》，http://pit.ifeng.com/a/20171117/53338905_0.shtml；周国长：《近年来俄罗斯社会对十月革命的评价》，《科学社会主义》2018年第2期）。陈余和刘显忠则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分析了俄罗斯学界和西方学界对十月革命的看法〔刘显忠：《俄罗斯对1917年俄国革命研究的百年变化》，《俄罗斯发展报告（2018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陈余：《西方学界对俄国十月革命的百年述评》，《俄罗斯发展报告（2018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六 对俄罗斯历史上其他重要问题的研究

俄罗斯国家杜马研究，著作主要有《近代俄国国家杜马：设立及实践》（刘显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该书论述了俄国国家杜马的起源和实践，对于了解俄罗斯立宪政治的历史传统，理解当代俄罗斯的政治改革之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

俄罗斯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和苏俄内战史研究，论文主要有《一战期间东线俄国士兵和德奥士兵联欢现象探析——基于俄国档案的解读》（周国长，《世界历史》2012年第6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的军事准备》（吴伟，《历史教学》2014年第12期），《面对生与死：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士兵的心态探析》（周国长，《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1期），《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若干思考》（张盛发，《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5年第1期），《苏俄国内战争时期西北白卫军研究》（周国长，《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2018年第14辑）。

俄罗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著作有《二战丛书：烈焰铸忠魂》（吴伟，2000），论文主要有《苏德战争前苏联政治宣传中的“德国形象”——以〈真理报〉为主要考察对象》（陈余，《俄罗斯研究》2014年第1期），《〈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苏联对德国宣传策略的转变》（陈余，《俄罗斯学刊》2015年第5期）。

贝利亚研究，论文主要有：《贝利亚事件的历史考察》（王桂香，《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1年第1期）；《揭开尘封的1953年苏联历史的面纱》（王桂香，《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3年第4期）。这两篇论文利用俄罗斯的解密档案文献，考证了贝利亚事件的经过，认为这一事件是苏联高层权力斗争的产物。

七 俄罗斯历史与文化研究室的翻译成果

本研究室成立18年来，翻译了多卷的俄文历史档案资料以及数十本（篇）俄文译著。

俄文历史档案翻译成果如下。刘显忠编著、翻译《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十